

## 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 *Review and prosp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胡少偉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 摘要

本文剖析了香港於回歸前後國民身份教育的發展，發現因受殖民地教育影響，回歸初期進展不大，近年雖有改善，但欠一架構。筆者提出香港要再建構國民身份教育，以全球、國家和本土三個層次去推行國民身份教育。前瞻香港學校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應以加強粵港融合和情意教育為要務。

### 關鍵詞

公民教育，國民身份教育，香港教育

###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he article reported that not much progress was made during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Hong Kong's return due to the colonial education's influence. Although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has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it lacks a model.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Hong Kong needs to reconstruct its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on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s for promoting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 here should emphasize on closer ties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affective education as key tasks.

### Keywords

civil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Hong Kong education

## 前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以一國兩制原則運作的中國特別行政區，標誌着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管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大部份港人的國籍一夜間由英國海外轉變成為中國香港。港人是否樂於接受這個新的國民身份 (national identity)? 這對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有著深遠的影響。記得在回歸前，港英政府為了實行有效的管治，長期以來在香港的學校教育皆避談國家和民族，以使大部份在港出生的華人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十分薄弱。故此，要建立學生的新國民身份便成為香港特區政府一項不可迴避的工作，而根據教育局負責公民教育官員的理解，國民身份教育的內涵就是要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這是一種集體認同的過程，是關乎如何在屬同一國家的群體中，建立一種「我們」的意識。在國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個人會意識到他跟屬於同一國族的人的共同特徵，從而建立族群的凝聚力和對國家的承擔精神”（張永雄，2005）。從中可見，建立香港學生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是學校公民教育核心的內容；而這篇文章會根據本土的學術文獻和官方資料，分別就回歸前、回歸後和近期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實踐作出論述，並提出要為香港學生建立一套含本土、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以便學生承擔推動香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 回歸前的國民身份教育

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因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香港社會的政治環境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變化，“但學校的政治教育仍顯示出驚人的連續性，因為傳遞給學生的主要資訊仍然是不關心政治的。在大多數學校中，有關國家民族和民主的

政治教育基本上不存在；學校沒有向未來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政治取向和民主能力，也沒有培養國家認同感”（謝均才，2001，頁152）。正如陳健強（1996）的分析：“作為一個欠缺政治實體性格的殖民地，居住於香港的人士，只有居民的類屬而無公民的身份。因此，百分之九十八生長於香港的中國居民，一方面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薰陶，另一方面亦接受了傳統英國殖民地教育，故其思想、行為、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皆傾向於子民式政治文化的運作情況”（頁234）。香港作為一個欠政治實體的殖民地，回歸前在不具備一個真正的公民環境下，當時推行的公民教育不能使學生孕育出一個對國家民族認同的國民身份；曾榮光等（1995）曾批評教育當局“推行學校公民教育，是一種無民族和無政治的教育，並建議1997年後學校公民教育應認真地處理公民權責教育及民族教育”（頁20）。

在回歸之前，香港的青少年對自己的國家是沒有認同感的，香港青年協會於1994年的研究中發現有三成半受訪青少年自認是沒有民族自豪感的；“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愛國，100分代表極其愛國，香港青少年平均只給自己57分；與國內兩地青少年的評分比較，相差甚遠：廣州青少年平均給自己90.4分，北京則92.4分”（香港青年協會，1994，頁8）。同時，在1995年的跨地域公民教育研究計劃中，“香港學生被問及喜歡持哪一種護照時，48%的學生說喜歡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13%的學生喜歡持其他國家的護照，只有約30%和9%的學生分別答喜歡持中國或香港特區護照”（Lee，1999，頁336）。在受到社會及教育團體的不斷批評下，香港政府在1995年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上，承諾在1996年9月向學校提供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及課程範圍。隨後成立的檢討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工作小組，於

1996 推出了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當中明確指出“一個人的公民身份決定於他的國民身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僅對人的國民身份及歸屬感形成十分重要，而且對一個國家的凝聚力的形成、對國力的增強也非常重要”（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頁 19）。然而，正如教聯會當時在意見書指出香港正處於回歸期的倒數階段，學校的公民教育應著重於為學生建立一個新的國民身份；可惜這個意見不單沒有獲回歸前港英政府的重視，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對此亦視若無睹，錯過了推行青少年國民身份教育的黃金時機。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1998 年的《青少年公民意識和道德價值研究》，“965 名 10 至 24 歲青少年中，有 54.3% 的認為自己對中國是沒有歸屬感的；而 2075 的成人中，更有 76.9% 認為青少年人對中國是沒有歸屬感的”（Commission of Youth，1998，頁 B51-53）。這研究引證了在回歸初期，大部份的香港青少年和學生依然對國家是沒有認同感的，亦談不上接納了自己的國民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民。

## 回歸後首五年國民身份的教育

“國家公民教育可以分成兩部份：一方面在幫助未來的公民發展，去發展他們的理智和感情上的基本態度，以適應社會規範；一方面在培養未來公民的政治知識，訓練未來公民的政治能力，並激發其愛國情操，為國家建立思想共識，促進國家之富強”（陳光輝、詹棟樑，1998，頁 77）。從上述台灣學者的定義中，政府在推行公民教育的角色是十分明確和重要的，但正如馮敏威（1999）當時的批評“香港回歸祖國已一年多，不少青年學生對中國認受性仍然十分薄弱，對香港社會和政治制度是認識不足；故此有必要著重增加以下的內容：認識一國兩制內容、學習基本

法、學習中國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家庭關係”（頁 203）。這類回歸後認為學生國民身份教育依然不足的批評，諷刺了當時特區政府教育官員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的不力，及至 2001 年教育當局終於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提出「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為課程改革四個關鍵項目內「德育與公民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觀之一，毫不含糊地要在課程改革中落實國民身份的教育，以使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

有關香港公民教育與國民身份教育的推行，一直是本土教育和社會學者的關注，王家英、沈國祥（2002）的研究發現“身份認同、自由人權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定位、香港本位意識及中國態度等問題上，2001 年的調查發現，香港青少年的香港本土認同仍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這情況在回歸四年後仍佔主導”（頁 38）。而香港青年協會於 2002 年的公民身份狀況研究亦發現“兩成六的被訪者表示對基本法完全不認識；而對基本法認識程度愈少，對香港歸屬感相對愈低。另外，五成被訪者表示不識唱國歌，但卻有逾七成被訪者認為，作為香港市民，應該要識唱國歌”（頁 67）。從中可見香港青少年於 01 年及 02 年期間的本土意識仍較強，而對與國民身份有關的基本法和國歌的認知卻強差人意；可以說，回歸後首五年香港學校的國民身份教育是缺乏和不足成效的。

與此同時，許景輝等於 2002 年有關發展中小學生國民身份的研究中，發現“學生意識到香港與內地和港人與中國人是有很大的分別的，他們認為內地好像是一個外國的地方，是一個與香港很不相同的社會”（Hui et al，2002，頁 4）。而阮衛華於 2002-2003 年的研究亦發現“政府及公共事務科教師在訪談裏，暗示中國的社會主義和香港的資本主義的分別及兩地人口出入境的限

制，使學生想到他們與內地同胞的分別，亦使他們國民身份的建立變得困難”(Yuen & Byram, 2007, 頁 34)。李榮安則根據“回歸後五年來港大民意調查的結果，發現港人自認的國民身份並沒有一致性的轉變，對其國民身份依然有一份矛盾的心態”(Lee, 2008, 頁 42)。歸納這三位學者的研究，香港學生在回歸後首五年仍感到對內地陌生、與內地同胞有別和未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為何回歸多年香港學生仍未意識到自己和內地同胞是同一國族的人呢？究其原因，正如賴柏生(2006)指出“雖然學校在觀念上贊同國慶升旗和唱國歌等愛國教育活動，但是很多學校老師不同意教育統籌局對中史課程內容的修改。很多爭議的背後反映香港本土和國家歷史觀點取態的相異；殖民主義的非政治化影響未因殖民管治結束而終結，兩地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仍會困擾回歸統一事業的發展”(頁 358)。

## 近年來官方國民身份教育的實踐

為了正視香港學校在推行德育和公民教育的不足，尤其是在回歸多年後學生仍未對國民身份有認同感，時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在 2003 年的國慶節期間，寫了一篇《談愛國：國民身份認同》的文章，倡導“青年人多讀點祖國的歷史，從日常生活中多感受中國文化，多關心和掌握國家的發展情況，有機會的話便到內地大江南北走走看看，親身體驗家國的人與事，感受香港與內地同胞血濃於水的關係”(羅范椒芬，2003, 頁 17)。按此思路，教統局(現教育局)於 2004 年暑期主辦首次「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組織了百多位香港預科生的代表，前往北京學習和體會國情；這是官方國民身份教育活動中較受肯定成效的一項，根據教育局網站，參與第九批交流活動學員的評估顯示，這個課程歷來都能提

升學員對內地的認識，“學員對自己的國民身份的認同和自豪感有明顯的提升，亦承諾會主動和別人分享自己對國家的情懷；這與第一期學員相若”(教育局，2007)。

謝均才(2007)認為“在官方的贊同和政府的支持下，國情教育課程主導了香港的國民教育；當中運用的民族文化取向，雖然有時是難以察覺和含蓄的，但這種國民教育看來是有助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認同”(Tse, 2007, 頁 245)；上文所提及的國民教育，其核心內容也就是本文所說的國民身份教育。正如李榮安(2006)在其專書內亦指出“在推行國民身份認同教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由認識國家到認同國家，需要有一個醞釀的過程”(頁 iv)。這種跨境親身體驗的學習交流活動，讓香港學生“在真實的環境、多角度感受和體會國家國情，從而孕育一份血濃於水的家國情懷，並勇於承擔促進國家福祉的責任”(張永雄，2007a)，確實有助學生與內地同儕建立一份我們的感覺，從而對國家和中華民族有一份感情，這對促進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有一定的作用。而為了支援教師落實國民教育，教育局除於 2004 年成立國民教育中心外，亦促成了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於 2007 年 7 月成立，以支援全港中小學教師在校內推行國情教育，提升教師和學生對國家發展和民族文化的認識，加強年輕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

除了在學校推動國民身份教育之外，特區政府相關的諮詢組織近年亦努力推動國民身份的教育，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聯同青少年事務委員會組成的國民教育專責小組於 2004 年 10 月首次推出心繫家國電視短片，透過宣傳廣告推廣國歌，當時雖受到一些政界和輿論界的批評；但該小組並不氣餒，於 2005、2006、2007 及 2008 分別推出志在四方、承我薪火、共耀中華及國家成就為主



題的國歌短片。2009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該小組於2009年10月推出全新一輯名為輝煌里程的電視宣傳短片，重點展現國家建國六十年以來的演變，突顯出國家的發展及成就，加深香港市民對國情的認識。在2005年，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局及香港電台合辦國民教育國際交流研討會，“這是香港首個以探討國民教育為題的國際研討會，目的是讓各地的專家就推廣國民教育的知識與經驗，與本地人士進行交流討論，從而令香港有所裨益”（公民教育委員會，2006）。可見，政府和相關諮詢機構在近幾年是較積極地推行國民身份教育；而公民教育委員會在2010年資助團體推行公民教育計劃中，亦預留資源資助國民教育或推廣《基本法》有關的公民教育活動；從中可見國民教育和基本法的推廣已成為公民教育的組成部份，這有利加強市民和學生對自己國民身份的認同。

## 國民身份教育的再建構

2009年是國家成立六十周年，教育局舉辦一系列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教育活動，以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和鞏固其國民身份；這些活動包括主題比賽、專題研習比賽、專家及學者講座、內地交流活動，以及國慶日特備節目。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於當年亦投放額外資源推廣國民教育，包括資助37,000名中小學生到內地學習和交流互訪；而為了更有系統地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教育局於09年帶頭成立了一個名為薪火相傳的國民教育平台，協調四十五項由非政府機構組織的交流活動（曾蔭權，2009），使各民間團體在這方面的工作得以相輔相成。可惜的是，去年有些本土調查卻反映了青少年的國民身份教育仍有不足；圓思顧問的調查指出大部

分學校舉辦的國情教育屬單向、片面及儀式化活動；岑家輝研究總監認為國民教育欠互動，難引起學生興趣（明報，2009.04.28）。同時，香港青年協會2009年9月公佈的青年的家國情調查，發現不少受訪者表示自己對國家的認識不足，其中以政治體制（26.8%）、國家歷史背景（20.9%）以及司法制度（19.8%）等方面的知識最感缺乏。而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於2009年底就通識教育設下20條時事常識，發現在中國國情方面，二成受訪中學生及逾一成大專生竟然不知道胡錦濤是國家主席；亦有一至四成受訪學生不知道西藏、內蒙古及新疆是中國國土，可見受訪大中學生欠缺相關國民教育知識（文匯報，2010.01.11）。從上述幾個青少年調查的發現，雖然政府和教育局已推行了一些國民身份教育的工作，但青少年在國民身份的認知和認同仍有不少的不足。

正如江宜樺（2000）的分析，“國家認同所表現出來的我群意識不是國家形成之前的意識，而是國家形成之後營造出來的意識；國家統治集體在國家認同的形塑上發揮重大作用，這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一致同意的”（頁200）。香港回歸令到大部份在港出生的青少年國籍有所轉變，要讓學生認同自己現有的國民身份，香港特區政府有不可迴避的責任；經過十年的探索，教育局從回歸初期不理國民身份教育的推行，到提出要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再到撥出資源和帶頭推動學生國民身份的教育，香港教育官員對國民身份教育的承擔感確有不少的轉變；在回歸十周年時，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2007b）指出“國民身份認同是一個多層面的概念，它不但代表個人意識到與相同國家的人都擁有共同的特徵（例如：膚色、傳統、習俗等）及與其他國家的人的差異，也代表一群人共同對

國家的一些符號(例如:政府、文化、語言、歷史、慶典等)的欣賞、接受和認同感”(頁27)。這個定義只集中展述了國民身份在國家層次的內容,而較少談及與本土社會特色和全球化中建構世界公民身份的需要;然而,教育官員近幾年能正面地提出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是國民身份教育的核心內容,這比回歸初期的態度是一種進步,值得肯定和欣賞。

與此同時,也有本土研究關注學生國民身份教育的情況,胡少偉、蔡昌(1999)在比較港日師範生的研究中發現“香港師範生大都肯定其在發展學生國民身份的責任;在他們心目中,香港人的國民身份主要是受種族、血緣和法律地位的影響”(頁49)。梁恩榮於2003年的研究則發現公民教育教師對國民教育有一個多重的理解,教師支持世界性國民主義、文化性國民主義和公民性國民主義分別有91.3%、90.4%和89.8%的高回應,而反殖國民主義則只有69.4%的中度支持(Leung, 2007, 頁74);當中,所提的國民教育是與本文討論的國民身份教育的內涵一致。要學生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教師認為應從多方面同時著手;而最為關鍵的是培育學生認同自己擁有的國籍身份。吳志森、李正儀和曲阿陽(1997)認為“國籍是一個人作為一個特定國家的成員而隸屬於這個國家的一種法律上的身份,由於他對這個國家來說具有這種身份,他就與他的國家發生一種特別的法律關係,他被認為是該國的公民,在該國享有外國人所不能享有的一些權利”(頁244)。所以,要成為一個合格的中國香港特區公民,學生便要衷心地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身份,在香港履行作為一個中國特區公民的權與責。

有關香港學生作為一個中國特區的國民應具備什麼質素,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2000年已

提出“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和了解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認識及樂於承擔作為香港特區的公民權責;認同學生自己所擁有的中國國民身份;對自己的民族——中華民族有自豪感並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頁6)。當中反映了該會認為香港學生國民身份的教育應包括香港歸屬感、公民權責、國民身份認同和民族觀等四方面。而羅天祐(2007)在批評香港中西史科的課程時亦曾指出“僅僅將本地、國家和世界歷史並列,並不能幫助學生對多元身份作出反思性的建構;現時兩套歷史課程的安排,無助學生處理好自己對香港、國家和世界的公民身份”(頁48)。故此,他提出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應有本土、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這個國民身份三層架構的論述與特區官方學生身份認同的建議十分相近;教育局網站在學生建立身份認同提出了以下的三個層次:家庭、社群及社會層次、國民身份層次和世界公民層次(教育局,2008)。下文將就國家層次、世界層次和本土層次的國民身份作出進一步的分析和討論。

## 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

張永雄(2005)在分析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時指出“國民身份認同的建立可以理解為個人對國族、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由於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涉及個人對國家的主觀認受,要建立這種我們或中國同胞的親切感,我們可以始於認知。”上述的描述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首先要讓學生對中華民族、中國傳統文化和國家有所認知和認同,這點相信在今天香港教育界是得到大多數認同的。然而,有民族研究學者指出國家認同並不同於民族認同,賈英健(2005)認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二者的側重點不同;民族認

同主要是側重於從文化上的認同，國家認同則主要涉及國家政權、主權、社會制度、社會權利等”(頁 181)。籠統地將國家與民族的認同視作一個學習內容，會令學生誤以為有民族認同便不需要認同國家；因此，在推行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便要注意分別從了解國情和認同民族等兩方面入手。

國民身份教育要讓學生對其國家有認同感，也就是要培育香港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和對其有歸屬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會之一，擁有 13 億人口，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使經濟得到發展，並成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內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然而面對着人口多和全球化的挑戰，國家仍有不少的困難和需改善之處。在民族認同方面，余建華(1999)指出“民族共同體的成員都產生一種特定的共同心理觀念、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等特質，這種與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質也就是人們所常說的民族性”(頁 11-12)。不少香港學生因過往殖民的教育關係，對自己民族有疏離感，更有人誤會中華民族等於是漢族，這是不對的；根據孫中山 1912 年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指出：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統一不同民族的一體才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正如陳偉光(1998)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壓迫制度，並且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使國家成為 56 個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友愛、互相支援、共同發展的民族大家庭”(頁 20)；要香港學生認識中華民族的含義，便要讓學生明白中華民族是一個 56 個民族的多元一體。

台灣葛永光(1991)認為“共同歷史和起源、共同的身體特徵及膚色，以中華文化為基底的文

化基礎，血緣關係的重視，共同的溝通語言的長期存在，以及以儒家宗教思想觀為基礎的共同宗教信仰，這些都是由中國人團體認同的原生感情的重要基礎，也是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仍能綿延不絕的主要原因”(頁 81-82)。要培育學生有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認同，其中一個內容是要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一份親切感，並內化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在推行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時，要避免盲目的民族主義，而要提倡理性的民族主義；牟鍾鑒(2002)曾告誡指出“民族主義如果排斥理性，任由情緒左右，便會成為一種害人害己的可怕破壞力量，歷史已經提供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故只有提倡理性的民族主義，才能盡量增強它的正面價值，攜手共建安寧繁榮的人類社會”(頁 73)。

## 全球化中世界公民的身份

全球化是從廿世紀末由資訊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人類大變革，互聯網的普及加速了全球經濟一體化，使各地人們感受到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加上交通工具的便利、通訊技術的更新、跨國公司的貿易、各地移民人口增加、跨境留學人數增加和旅遊事業的發展，世界各地的人確實更親近了。因此，有學者指出“世界主義者對國民身份比過往在需要性和可行性方面提出更多的爭議，他們認為現時人際互動的形式令人的世界性身份認同變得更為持久，亦因而對國家政府或種族部落式的公民身份有更多的挑戰”(Reimers, 2006, 頁 383)。這種認為推行世界公民教育比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更為合乎全球一體化的觀點，但這種論述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正如羅永華和吳浩明(2009)認為“在香港和上海的個案中，國家政府繼續界定和影響國家和地區的公民教育課程，地方政府在設計集體身份認同



和重整公民教育時是有其相對的自主和本土發展的考慮”(頁 887)，這指出了在全球化情境培育學生的國民身份要注意本土的特色。與此同時，Scholte(2005) 提出“全球化對個人身份有三方面的影響，包括：國民身份認同的激增、鼓勵非領土身份建構及更大的身份雜交”；可見，要學生在全球化中建立一個清晰的身份認同是並不容易的。

在這個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不少地區推行教育改革時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會加強培育學生的國際視野，在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6 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中已提出要讓學生成為一個具有參與和貢獻精神的世界公民，要求學生關注世界性的問題如貧困、歧視、環境污染和戰爭等，並認識國際社會和各種國際組織的作用。而李榮安和古人伏(2004)的香港和上海的比較研究中亦指出“在一個多元化交融、資訊科技發達、國際交往頻繁的世界中，我們應培育能夠面向世界的下一代。是故，我們的教育亦應致力培育青年人良好的公民質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是全球的一分子，明白全球互相依存的關係，進而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為促進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全球的社會公義與平等作出貢獻”(頁 xxvi)。從中可見，在全球一體化中，不管香港抑或面向國際的內地城市皆十分重視培育學生具備成為一個世界公民；而香港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國際城市，香港學生確實要有一定的環球視野，也就是說，香港學校要讓學生認識和掌握世界層次國民身份的內容和能力。

香港社會需關注學生在世界層次的國民身份的建構，亦得到一些內地學者的認同和肯定，王學風、岑暉(2008)指出“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若繼續保持，就必須以具備國際視野和國際胸襟的人口之培養為前提；香港人口的國際化，必會帶來多元價值觀念和國際公民意識，亦必會淡化

國家民族觀念。國際視野教育與國家民族教育如何取得平衡，將是國家民族教育面臨的一大課題”(頁 111)。而要平衡世界與國家層次公民的張力，吳叡人(1999)的建議可作關心國民身份教育者的參考，“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核心不是真實與虛構，而是認識與理解，唯有透過客觀理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者的認同)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共存之道，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之道”(頁 xix)。假若學生能理解香港在國際社會上的獨特性，又能理性和客觀地學習世界公民的共性，便能有效地與別地的學生在國際間和平共處。

### 本土層次國民身份的內涵

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祖國，成為以一國兩制原則運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標誌着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管治，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但也因為一國兩制的原因，上文幾個本土研究早已發現不少香港學生感到本土和內地的不同。香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這與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是不同的。故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只講認同國家和世界層次的內容，也需同時留意香港社會的本土特色；正如 Hobsbawm(2000) 指出“若我們不將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將會變得毫無意義”(頁 10)。在國家的憲法和香港的基本法中，香港的土地雖然是國家的一部份，但香港公民的權責在基本法中與內地憲法內公民權責是有些分別的。因此，在香港學校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輕視讓學生理解本土特色的重要性。



## 港人對身份類別的認同

調查日期	香港人	中國的香港人	香港的中國人	中國人
6/2010	25.3%	31.3%	14.8%	27.8%
6/2009	24.7%	32.0%	13.3%	29.3%
6/2008	18.1%	29.2%	13.3%	38.6%
6/2007	23.4%	31.8%	16.7%	26.4%
6/2006	24.8%	25.1%	14.9%	34.6%
6/2005	24.0%	21.2%	14.7%	36.4%
6/2004	28.0%	21.2%	14.3%	33.0%
6/2003	36.7%	19.2%	11.9%	29.0%
6/2002	32.2%	18.1%	13.0%	32.5%
6/2001	36.1%	18.3%	13.3%	28.4%
6/2000	35.5%	22.9%	14.0%	22.8%
6/1999	39.9%	25.0%	11.2%	17.0%
6/1998	34.2%	18.6%	18.7%	24.8%
8/1997	34.9%	24.8%	20.1%	18.6%

(港大民意網站, 2008)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港人的定義和其身份認同也是十分獨特的；根據上表港大民意網站的資料，回歸時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自認為港人，而自認中國人的卻只有 18.6%；回歸十餘年，今天自認港人的受訪者還有約四分之一，而自認中國人亦增至近三成。當中雖然有一定的變化，但仍不能不承認的是，還有一部份港人只對香港有歸屬感，而對國家是沒有認同感的。究其原因，根據入境事務處 2006 至 2007 年度年報，該處截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止簽發了 5,308,632 張智能身份證，但卻只發出 4,119,504 本香港特

區護照，當中差額有 120 多萬人；也就是說，不少在港居留的市民並非是持中國國籍的。而根據頭條日報於 2008 年 6 月 2 日的報導，有外國護照的人口估計約有九十萬人；要求這批不是中國籍的香港永久或非永久居民對中國政府有認同感，是不大可能的。然而，這批近一成多非中國籍香港居民卻對本土社會有一份感情；加上在基本法中又容許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可參與立法會的選舉，這批居民已成為香港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一群。面對這樣複雜的國籍和居留權人口，香港學校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的難度比不少國際城市更大。

但不管如何，香港教育官員和學校依然是有責向學生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正如鄭永年(1998)主張“國家民族主義對有合法身份的公民一視同仁，不管他們的種族性、民族認同感或文化認同如何”(頁42)，因此，政府和學校必須要根據基本法，去培育本土學生認識其國民身份、了解相關的公民權責及對我們有一份親切感。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文件，又是中國全國性的法律，其本身已體現出一國兩制的特色。正如香港青年協會於2002的研究發現，青少年認識基本法的程度與其香港歸屬感是成正相關的；故此，加強學生認識和理解基本法條文和精神，不單可使他們接納其國民身份，亦有助鞏固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但可惜的是，根據有教育團體於2008年調查發現“受訪教師對教育局及學校推行基本法教育的表現，如以10分為滿分，5分為合格，0分最差，教育局的平均表現得4.95分，學校的表現平均為4.62分，兩方面皆為不合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08)。看來特區教育局應認真研究在學校加強基本法教育，以使學生能透過基本法教育而明白香港本土社會的特色。再者，香港在回歸十餘年中曾出現了三次人大釋法，而因香港的普通法與內地的大陸法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使不少港人誤解了釋法是違反一國兩制和對基本法產生了負面的印象；但根據本港法院的判決，中央政府是在合憲、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基礎上釋法的。故在學校開展基本法教育讓學生理解基本法和明白釋法對香港的作用，將有利學生鞏固其本土層次的國民身份。

### 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是獨特和唯一的，回歸前因港英政府的無國家民族和非政治化的殖民地教育，使大部份在港出生的學生對中國和香港皆

無歸屬感和認同感。回歸後，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教育是特區政府教育部門不可推卸責任，當中政府和學校既要加強學生在國家層次的認知，包括了解國家的歷史、中華民族的特性、中國傳統文化和內地人民生活的現狀，又要同時建構學生的世界性和本土化的國民身份，可見香港學校要做好國民身份教育的難度很大；尤其是在一國兩制的情況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制度和公民權責確實是有很多的不同，但無論如何，正如白傑瑞(2007)指出“要把這個(香港)多元文化的社會融入一個多元文化的中國，教育推動著一個將香港主流文化身份與中國主流文化身份融合的過程”(頁32-33)。因此，特區教育部門在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教育和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是有一個重要和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2009)認為“粵港融合是大勢所趨，全球的經濟格局正發生改變，區域性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世界潮流；藉著粵港澳一體化提升競爭力，香港方可抗衡愈演愈烈的區域競爭。”這反映了進一步推動粵港融合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當中必須讓學生理解粵港自古以來的關係，“香港市民大多數是來自廣東省的移民或是這些移民的後裔，他們絕大多數的省籍認同均以廣東省為主”(王家英、尹寶珊，2008，頁20)；時至今天，香港和內地依然血濃於水唇齒相依，不管在歷史文化、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民生和國際參與等方面皆有細水長流的互惠合作關係；“但因前殖民地政府的影響，中小學各科課程皆有意無意之間淡化了兩地唇齒相依的學習內容，使全港中小學生未能在正規的課堂教學中學習到香港與內地相關的資料，這亦造成了港人對內地國情知識的匱乏和容易產生與國家疏離的情感”(胡少偉等，2010)。故此，特區政府應吸收過往的經驗，不再忽視在學校課程內更新

與國民身份有關的學習內容；令人欣慰的是，教育局今年初已提出將會在中小學課程加入多些與內地相關的學習內容，“教育局計劃在 2012/13 學年於高小的常識科中加入中國近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內容，以及在初中新增生活與社會科，讓學生更多機會接觸國情知識，了解香港和內地的文化和經濟發展”（大公報，2010.01.06）。

回顧本港在回歸後國民身份教育的發展歷程，官民皆認為成功的國民身份教育是由政府帶頭推出的國歌電視短片和組織學生進行跨境體驗交流活動，這些有成效的國民身份教育活動值得教育官員繼續支持和深入推廣。說到底，沒有一個政府能無視要培育學生建構國民身份教育的責

任；但不能忽略的是，國民身份教育不單是一種知識的理解，也是一種情意的培育。正如梁恩榮（2008）指出“國民教育是有知性和情感的雙重使命，所採用的教學法必需能滿足這雙重使命。雖然強調情感的做法並不常見於以認知為主導的西方公民教育文獻，有時甚至常被認為是一個障礙批判思維的東西；但這被忽視了的情感在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加強社羣中各成員的團結意識和歸屬感。”因此，教育局和學校在建構學生的本土、國家和世界層次的國民身份時，除了在認知理解方面入手外，也要留意培育學生對本土、國家和世界社會的情意，這是香港學校落實推行國民身份教育的要務。

## 參考文獻

入境事務處。《入境事務處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年報》。2008 年 8 月 2 日，取自

[http://www.immd.gov.hk/a\\_report\\_06-07/big5/chapter03/mainFrame.htm](http://www.immd.gov.hk/a_report_06-07/big5/chapter03/mainFrame.htm)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特別小組（2009）：回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研究報告。2010 年 7 月 23 日，取自

[www.cmab.gov.hk/doc/GPRD\\_outline\\_plan\\_report\\_20090922\\_full\\_tc.pdf](http://www.cmab.gov.hk/doc/GPRD_outline_plan_report_20090922_full_tc.pdf)

文匯報（2010）。《13% 大專生不知誰是國家主席 仁大訪逾千大專中學生 揭港生常識差》（頁 A25），2010.1.11。

王家英、尹寶珊（2008）。《從民意看香港的社會與政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家英、沈國祥（2002）。《回歸後香港青少年的公民意識及公民教育態度 延續與變化》。香港：香港亞太研究所。

王學風、岑暉（2008）。香港國家回歸後國家民族教育的若干問題。載《教育論壇》，第 1 期，頁 108-111。

白傑瑞（2007）。白傑瑞分析教育改革與身份認同的關係。《信報財經月刊》。第 363 期，2007 年 6 月，頁 32-33。

江宜樺（2000）。《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牟鍾鑒（2002）。現代民族主義及文化的和理性的民族主義。載洪泉湖、謝政諭（編），《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頁 59-78）。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余建華（1999）。《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雲的交匯》。上海：學林出版社。

吳志森、李正儀、曲阿陽（1997）。《香港居民的國籍和居留權：1997 年前後的延續與轉變》。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吳叡人（1999）。認同的力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榮安 (2006)。 序言 。載李榮安、莊璟珉、蕭偉樂 (編著)。《國民身份認同與世界公民教育：專題研習、綜合人文科與常識科的延伸》。香港：當代發展公司。
- 李榮安、古人伏 (編) (2004)。《世界公民教育——香港及上海中學狀況調查研究》。香港：樂施會。
- 明報 (2009)。《國民教育欠互動四成學生無興趣》(頁 A15)，2009.4.28。
- 政府統計處 (2007)。《香港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主要統計表》。2010 年 8 月 2 日，取自 [http://www.censtatd.gov.hk/products\\_and\\_services/products/publications/statistical\\_report/population\\_and\\_vital\\_events/index\\_tc\\_cd\\_B1120051\\_dt\\_detail.jsp](http://www.censtatd.gov.hk/products_and_services/products/publications/statistical_report/population_and_vital_events/index_tc_cd_B1120051_dt_detail.jsp)
- 胡少偉、蔡昌 (1999)。 比較港日兩地師範生的國家觀念 。載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編)《香港教育青少年的品德和公民教育》(頁 40-51)。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 胡少偉等 (2010)。《香港國民教育的新焦點：理解香港與內地合作的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 香港青年協會 (1994)。《京穗港青年比較研究系列 主題三：國家與民族》。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 香港青年協會 (2002)。《社會資本之公民身份狀況研究》。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00)。《香港中小學生國民質素研究報告》。香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2008)。《「教師看學校的國民教育」問卷調查簡報》。2010 年 7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hkfew.org.hk/Uploads/news/20080619.pdf>
-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Hobsbawn, E.J.] 著，李金梅譯 (2000)。《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張永雄 (2005)。《學校推行國民教育之香港經驗：機遇與挑戰》。2010 年 7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cpce.gov.hk/national-education/pdf/Mr\\_Cheung\\_Wing\\_Hung\\_Full\\_Paper.pdf](http://www.cpce.gov.hk/national-education/pdf/Mr_Cheung_Wing_Hung_Full_Paper.pdf)
- 張永雄 (2007a)。《學校推行國民教育：十年回顧與發展》。2010 年 8 月 2 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langno=2&nodeID=6049>
- 張永雄 (2007b)。 香港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回顧與發展 。《青年研究學報》。第 2 期，2007 年 7 月，頁 27-38
- 教局千七萬推國民教育 (2010.1.6)：《大公報》，頁 A09。
- 教育局 (2007)。《國情教育課程 04/2007：個別範疇前測後測的結果及轉變》。2010 年 7 月 23 日，取自 <http://resources.edb.gov.hk/mce1/NE9/table2.pdf>
- 教育局 (2008)。《德育及公民教育》。2010 年 7 月 23 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28/identity.pdf](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28/identity.pdf)
- 梁恩榮 (2008)。 香港公民教育老師對國民 / 民族教育的理解和教學法 。《基礎教育學報》17(2)，頁 139-158。
- 陳光輝、詹棟樑 (1998)。《各國公民教育》。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陳建強 (1996)。 香港公民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載於《道德與公民教育》(頁 234)。香港：香港教育研究所。
- 陳偉光 (1998)。《民族性》。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曾榮光等 (1995)。 民族教育與公民權責教育之間：過渡期香港公民教育的討論 。載《教育學報》第 23 期第 2 卷 (頁 1-2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曾蔭權 (2009)。《羣策創新天——行政長官施政報告》(頁 29)。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 港大民意網站 (2010)。《港人對身份類別的認同》。2010 年 7 月 21 日，取自 <http://hkupop.hku.hk/>
- 馮敏威 (1999)。 香港學校的公民教育 。載葉國洪等 (編)，《香港武漢交流 共迎世紀挑戰 1998 香港、



- 武漢教育交流合作研討會論文集》(頁 199-203)。香港：香港教師中心。
- 葛永光 (1991)。《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書局。
- 賈英健 (2005)。《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國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課程發展議會 (1996)。《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香港教育署。
- 鄭永年 (1998)。《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民族國家向何處去？》。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賴柏生 (2006)。《香港回歸後學校公民教育的發展及矛盾》。載張詩亞(編),《直面血與火：國際殖民主義教育文化論集》(頁 356-358)。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 頭條日報 (2008)。《香港九十萬人持外國護照》。2008年7月30日, 取自  
<http://prd2-libwisearch.wisers.net/ws5/tool.do?>
- 謝均才 (2001)。《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載貝磊、古鼎儀(編),《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頁 137-153)。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
- 羅范椒芬 (2003)。《談愛國：國民身分認同》。載教育統籌局(編)(2006),《談美德·論價值 德育教材手冊》(頁 16-17)。香港：教育統籌局、明報。
- Commission on Youth(1998). Report on the Quantitative Survey on Civic Awareness of Youth. *Study On Civic Awareness & Moral Values Of Youth*.
- Hui, K. F., Cheung, K. K., Wong, Y. N., & Lee, C. F. (2002).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to Development Student's National Identit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in Hong Kong (the final Report)*.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w, W. H. & Ng, H. M. (2009).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eveled Citizenship Education: A Tale of Two Chinese Cities, Hong Kong and Shanghai.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ume 111, Number 3*.
- Lee, W. O. (1999). Controversies of Civic Education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Hong Kong. In Purta, J. T., Schwille, J. & Amadeo, J. A. (Eds), *Civic Education Across Countries: Twenty-four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Project* (pp. 313-340). Netherlands: Eburon.
- Lee, W. O.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Global Citizenship. In Grossman, D. L., Lee Wing On & Kennedy, K. L. (Eds), *Citizenship Curriculu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p. 29-42).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ung, Y. W. (2007). Understandings and Teaching Approaches of Nationalistic Education: The Case Hong Kong. *Journal of Pacific Asian Education*, 19(1), 72-89.
- Lo, T. Y. (2007). Nationalism and globalism in the junior secondary history curricula of Hong Kong and Shanghai. *Journal of Compare*, 37(1), 37-51.
- Reimers, F. (2006).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Education: Examining the Public Purposes of School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Prospects*, 36(3), 275-294.
- Scholte, J. A. (2005).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 Tse, K. C. (2007). Remaking Chinese identity: Hegemonic struggles over national edu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3), 231-248.
- Yuen, T. & Byram, M. (2007). National identity, patriotism and studying politics in schools: a case study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mpare*, 37(1), 23-36.